

论中国 17 世纪通俗文学 场的时代语境与运作模式

○ 王委艳

——以话本小说为中心

明朝中后期的江浙闽一带,以手工业、商业为代表的经济繁荣发展,出现了中国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尤其是丝织业,大量机房的出现、雇佣劳动关系产生了;制造业的繁荣直接刺激了商业的繁荣,城市在手工业和商业繁荣的背景下,出现了一些现代城市的特征。此时,出现了以王阳明、李贽等为代表的张扬人性的新的思想思潮,极大地影响了 17 世纪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文人的思想。此时,造纸业和印刷业的发展直接推动了书坊的出现,这种具有现代出版特征的书坊为话本小说的产生和繁荣提供了很好的物质基础。在明代,各种形式的官办、民办教育机构大量涌现,科举的窄途已经无法适应大量文人追求前途的要求,文人开始从书斋走出来从事商业活动,比如商品买卖、书坊经营、职业创作等等。同时,教育业的发达提高了国人的文化素养,识文断字已经不是小部分人的专利,教育开始走向大众化,这就客观上制造了一大批的文化消费者,话本小说的繁荣就有了读者基础。下面,笔者具体描述明后期的时代经济、思想潮流以及文人的生存状况,以期还原话本小说产生的时代背景。

一、明中后期至清初的经济状况和造纸业、坊刻业的繁荣

话本小说作为书面通俗小说,其传播受到各方面的限制,比如经济状况、造纸业和印刷业的发展以及大众文化水平等等,因此,话本小说在明清之际的繁荣有着客观原因。了解明清之际的经济等状况,对于理解“说话”艺术何以在宋代就已经成熟而只有到了明中叶以后才出现话本小说繁荣发展的原因,而且,对于理解话本小说的艺术和思想也是一种重要的参照。明朝的城市较宋代更加繁荣,尤其是在江南,市镇的数量、人口大幅增加,商业繁盛,人员流动规模很大。尤其明中叶以后,江南出现了许多工商业发达的大城市,比如苏州、杭州、湖州等等,其中苏州最为繁华,出现了大量的手工业丝织工厂,

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这在话本小说中也有表现。明人莫照有《苏州赋》云:

列巷通衢,华区锦肆,坊市綦列,桥梁栉比,梵宫莲宇,高门甲地。货财所居,珍奇所聚,歌台舞榭,春船夜市。远土巨商,它方流妓,千金一笑,万钱一箸。所谓海内繁华,江南佳丽者。^①

城市的繁荣兴盛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这样就形成了城市的市民阶层,他们多以商为业,商业文化和市民的逐利心态逐渐成为江南社会思潮的新动向。而江南的造纸业和印刷业也在此时进入了繁盛时期。造纸业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至宋元时期,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大大推进了造纸业的发展,尤其是江南竹纸的发明使造纸成本大大降低,宋应星《天工开物·杀青》中详细记载了竹纸的制造工艺和流程,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详细记载了各地的纸张和印刷情况:

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本,宋最善,近世甚希。燕、粤、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凡印书,永丰绵纸上,常山柬纸次之,顺昌书纸又次之,福建竹纸为下。棉贵其白且坚,柬贵其润且厚。顺昌坚不如棉,厚不如柬,直以价廉取称。闽中纸短窄齟脆,刻又舛伪,品最下而直最廉。余框篋所收,什九此物,即稍有力者弗屑也。近闽中则不然,以素所造法,演而精之,其厚不异于常,而其坚数倍于昔。其边幅宽广,亦远胜之,价值即廉,而卷帙轻省,海内利之,顺昌废不书矣。^②

胡应麟生活在 1551-1602 年间,其记载基本还原了当时的造纸印刷业的如下情况:其一,当时造纸业和印刷业已经比较发达,形成了全国几个主要的造纸、印刷基地;其二,各地纸质不一,印刷质量参差不齐,且相互之间有竞争;其三,在造纸、印刷业者中,福建竹纸质低价廉,

但销路很广,即如胡应麟本人“余框篋所收,什九此物”,但闽中经过改进造纸工艺,终使价廉物美的竹纸获得竞争力,“价值即廉,而卷帙轻省,海内利之”,使别的竞争对手逐渐丧失市场,“顺昌废不书矣”。在明代的刻书业主要有三种形式,即官刻、私刻和坊刻,其中坊刻直接面对市场,明清之际的话本小说等通俗文学作品大都出自坊刻。亦如胡应麟记载,由于福建竹纸的工艺改进和价钱降低,坊刻在福建建阳地区兴盛是自然的事:

自宋以来,福建建阳一直是全国最大的坊刻中心之一。入明以后,建阳刻书持续发展,嘉靖、隆庆间刻书渐趋丰富,万历达到高峰,天启、崇祯余波未平。据统计,明代建阳有名可考的书坊有64家,刻书计655种。刻书内容充分显示了坊刻的实用性特点,大致可分为科举应试、医书、民间日用、通俗文学四类,而在通俗文学类中又以白话小说为多。1987年,韩锡铎、王清原综合各家所著书目提要写成《小说书坊录》,是迄今为止较全面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该书所录明代小说有225部,其中建本小说66种,占明代现存小说的29.3%。而据现存作品统计,自嘉靖至泰昌(1522-1620)90年间,建刻白话小说共23种,占整个明代通俗小说总存量的近20%,高居江浙地区刻本数之上,居全国第一位。^③

福建坊刻的繁荣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这和福建的造纸业的发达有很大关系。福建坊刻的发达还和出现了一批有名的坊刻经营者有密切关系,比如建阳余氏家族之余象斗,坊刻刘氏家族之刘求茂安正堂、刘氏乔山堂,建阳熊氏坊刻之熊龙峰忠正堂(话本小说的最早刊本之一《熊龙峰刊刻小说四种》即出自此坊)等等。这些书坊主不但是白话小说的出版家,有的还是小说的编撰家,他们了解市场需要,运用多种方式进行促销,比如增加小说评点、增加绣像插图、请名人写序、甚至冒充名人或以名人的名义为其小说寻求销路。但福建建阳地区的坊刻业随着小说创作中心向江浙一带转移,在白话小说尤其是话本小说的刊刻方面逐渐向江浙一带转移,^④出现了苏州、杭州、金陵等以刊刻通俗文学为主的书坊中心,话本小说的代表作“三言二拍”、《石点头》《今古奇观》等等都出自苏州坊刻。这一方

面说明纯粹的商业运作无法完全决定通俗文学的发展走向,一方面说明以话本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的运行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

二、明中后期的思想潮流和文人的生存状况

明朝中后期,伴随工商业的发展和经济模式、生产关系的悄然转型,以市民阶层为代表的新兴阶层的出现,在思想界也表现了一些新的思想潮流。以王阳明为代表的“王学”就出现在此时。王阳明改程朱理学之“理”本体为“人”本体,倡导自然人性,肯定人的情感和欲望:

耳目、口鼻、四肢,身也,安能视听言动?心欲视听言动,无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但指其充塞处言之为之身,指其主宰出言之为之心,指心志发动处谓之意。指意之灵明处谓之知,指意之涉着处谓之物,只是一件。意未有悬空的,必着事物,故欲诚意则随意所在某事物而格之,去其人欲而归于天理,则良知之在此事者无蔽而得致矣。此便是诚意的功夫。

这里指出了身与心的相互依存关系,即无身即无心,反之亦然。王阳明“心学”即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王阳明肯定人欲,指出人的“七情之乐”的合理性,指出“良知”乃人之心,“致良知”即是人的主体德性,是人的自然天性而无需受外界影响:

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⑤

王阳明“心学”标志着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这和程朱理学之“存天理、灭人欲”对比鲜明。王阳明“心学”之“明德亲民”的民本思想体现了一种平民意识,所谓“满街都是圣人”(王阳明弟子王艮语),人若“致良知”即达“圣境”。

王阳明之后有一大批追随者,其中诸如王龙溪、泰州学派王艮、何心隐、李贽、以及公安派袁宏道、冯梦龙等等。李贽倡导自然人性论,指出人的“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即是人之常情,物之常理。同时,李贽肯定人的私欲,指出:

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

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如服田者,私其秋之获,而后治田必力;居家者,私积仓之获,而后治家必力;为学者,私进取之获,而后举业之治必力。故官人而不私以禄,则虽招之必不来矣;苟无高爵,则虽权之必不至矣。^⑥

李贽针对文学提出“童心说”指出:

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长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大贤言圣人之道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甚么六经,更说甚么《语》《孟》乎!^⑦

李贽“童心说”倡导自然人性,反对道学、名教,主张言由心发为真,张扬个性,无疑对于虚假文风当头棒喝。童心,即人的自然真心,只要文出真心,即为“至文”。李贽充分肯定了《西厢记》《水浒传》的价值,这对于当时的通俗小说、文艺的发展无疑具有张目价值。李贽之后,公安派以袁宏道为首,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与王阳明、李贽的张扬自然人性一脉相承。话本小说奠基人之一冯梦龙,主张“情教”无不受此影响。明中后期这些主张人性、个性的思潮对于儒家“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构成了巨大冲击,在思想界出现了多元并存的局面。对于人性的觉醒和发现,对于自然人性的倡导无疑极大地影响了明朝中后期的思想潮流。出现于话本小说中大量反映市民阶层的故事,以及对商人逐利的肯定,先进的妇女观念无不受到来自这股思想潮流的影响。

明中后期至清初,文人除了在思想上受到冲击之外,来自另一方面的冲击也非常之大,即自身生存的困境。明朝在前朝科举制的基础上制定了详细的科举取仕制度,从学校制度到考试形式组成了封建社会完备的选人制度体系。清朝则继续延续这一制度。明清的考试形式有

童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级级筛选之下使许多考生皓首穷经,有的甚至在连年的失败中打发人生,这实为人生悲剧和社会的悲剧。在清末梁启超等举人的《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中历数八股取士之弊,指出:

邑聚千数童生,拔十数人为生员;省聚万数千生员,拔百数十人为举人;天下聚数千举人,拔百数十人为进士;复于百数十进士,拔十数人入于翰林。此其选之精也。然内政外交治兵理财无一能举者,则以科举之试以诗文稿法取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故也。^⑧

梁启超本人就是通过层层选拔出来的,他自然了解生员们的苦辛。这是清末在面临国家危亡之时,这些有识之士、热血青年的改革呼声。在明代,生员们的状况与此无二。话本小说两位大家冯梦龙和凌濛初年轻时科考蹭蹬,冯梦龙(1574-1646)到崇祯三年57岁时才补贡生,凌濛初(1580-1644)55岁补贡上海县丞。根据冯梦龙、凌濛初二人的生卒年代,笔者对当时登科人数比例进行进行查阅:^⑨

表1 明代进士年均登科数占年均人口数的比例

年份	年均人口数	年均登科数	所占比重%
1619-1625	51655459	151	0.000292

表2 明代进士录取比例占考生人数比例

年份	考生人数(人)	录取数(人)	比例%
1601	4700	300	6.4

表3 明代江南乡试录取比例

年份	考生人数	录取人数	比例%
1630	7500	150	2.0

这些数据表明,科举制度在明代的确是读书人身心疲惫的事业,有的人一辈子也没有出头之日。冯梦龙和凌濛初的遭遇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且他们二人也未必比其它人结果更差,因为许许多多的生员最后连补贡的机会也捞不到。科举制度虽然摧残人才,但却催生出一大批学校,明代除官办学校外,私人办学非常兴盛,江南更是书院林立,就福建一省来说,官、私书院有名可考的就达174所,^⑩可见教育机构的发达。伴随学校的是一大堆读书人的出现,这客观上在普及文化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此众多的生员,如此之少的录取人数,使很多人无缘

榜名。再加上明中后期江浙一带工商业的兴起,使很多读书人放弃举业而转向其它领域,比如经商、坐馆、写作、出版行业等等,以此来解决生计问题。在话本小说中,就有不少篇目描述了读书人为生计转向其它行业的情况。《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之前,参加乡试无盘缠,向其岳父胡屠户去借钱,被胡屠户骂了个狗血喷头,说:“趁早收了这心(即科考),明年在我们行事里替你寻一个馆,每年寻几两银子,养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你老婆是正经。”读书人如此窘境,绝非吴敬梓夸张。

三、17世纪以江浙为中心的通俗文学场的运作模式

17世纪是一个多事之秋,明清易代是这个世纪的大事,朝代更替给明代读书人带来的不仅是因社会动乱而日益恶化的生计问题,而且,更加触及灵魂的是对新朝廷的态度问题,很多人选择抵抗,也有很多人选择做隐士,当然不少人选择入仕。17世纪以话本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的繁荣绝非是一个偶然现象,这也许包含读书人的一种生存方式,而造纸业、印刷业的发达,市民阶层的壮大,识文断字的人口数量的增加等等这些客观因素为明末清初话本小说等通俗文学的发展制造了非常有利的社会背景。以“作者——作品——出版商——读者”的关系链条为基础的文学场,在古代中国第一次出现在江浙一带,形成了话本小说运作的市场化模式,这种模式将对话本小说的文本形式和价值追求产生很大影响。话本小说作为一种被称为“亚文化”(赵毅衡语)的小说类型,作为被历代正统文人所不齿的“小道”,从事话本小说的创作,其本身并不能作为一种迂回的“进取”之道,也不能为作者带来名声。即使如冯梦龙、凌濛初这样的大家,在补贡之后即不再涉足话本小说,而且在记录其生平的县志、墓志铭中已难寻为他们带来声誉的话本小说——“三言”和“两拍”。而一个客观情况是,话本小说大都不署真名,有的更是没有署名,导致现在大多话本小说不知道作者是何人。所有这些说明,从事通俗小说创作并不能够为作者带来声誉上的好处,以及对于这些封建文人孜孜以求的科考事业亦无任何帮助,甚至会带来麻烦。那么,唯一的合理解释是创作小说是为生计所迫的有偿劳动。因此,小说

作者和书坊主之间的关系即类似于今天作者和出版商的关系。这就导致一些职业、半职业作家的出现。比如江西文人邓志谟长期受雇于福建建阳书坊,编撰了大量通俗小说;广州痒生朱鼎臣长期服务于福建书坊,编撰了多种通俗小说等。^①作家和出版商的这种关系成为明清之际江浙一带文学场生成的基础。下面,我们试着描述一下这个文学场的运作模式。

首先是社会客观条件。江南造纸业和印刷业的发达,造纸工艺的改进和成本的降低为书籍的印行提供了物质基础,于是,以坊刻为主的图书市场形成了。坊刻最初以盛产质优价廉的竹纸的福建为中心,坊刻主为谋取利益,刻印通俗读物以满足普通百姓的阅读需求,后来便涉足通俗小说的印行。科举考试的副产品——大量教育机构的出现培养出了越来越多的读书人,这样便客观上提高了人们的文化水平、培育了广大的读者市场。但科举窄途无法给更多人提供出路,虽然很多人皓首穷经,但也会有很多人由于生计所迫从事科考以外的事业,参与通俗文学创作、参与书坊的编辑和经营或受雇于书坊就是他们的谋生手段之一,因此便出现了具有一定创作才华和编撰才能的书坊主,比如凌濛初就出身于乌程凌氏刻书世家,陆文龙、陆人龙兄弟不但是书坊主还是话本小说著名作家等等。明清易代,使很多读书人在生活,但更多的是在心理上难以适应,绝意科考选择创作也是出路之一。所有这些客观条件表明,话本小说创作繁荣出现在明清之际并非偶然。

其次,书坊主的经营与作家群的出现。书坊主为谋取经济利益会根据他们了解的读者市场需求进行出版,话本小说的繁荣与此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冯梦龙《古今小说》一开始并非能够保证一定能为书坊主带来利益,其最初也是一种商业性的实验。冯梦龙在《古今小说叙》中写道:“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明天许斋(应为刻坊之名——引者)在《古今小说识语》中说:“本坊购得古今名人演义一百二十种,先以三分之一为初刻云。”^②对于这两篇叙和识语,起码包含如下意思:其一,冯梦龙是应书坊主之请而编撰《古今小说》,这不会是一种义务劳动,这在天许斋识语中说得很清楚,即“购得”;其二,天许斋以三分之一初刻,有

一种市场实验性质,其三,取名《古今小说》而非后来的《喻世明言》,说明一开始并没有一下子出版“三言”的计划,这说明《古今小说》刊刻的实验性质。这从后来的衍庆堂《喻世明言识语》中可得到答案:“绿天馆初刻古今小说四十种,见者侈为奇观,闻者争为击节,而流传未广,搁置可惜。今版归本坊,重加校订,刊误补遗,题曰《喻世明言》……”而在衍庆堂《醒世恒言识语》中说:“本坊重价购求古今通俗演义一百二十种,初刻为《喻世明言》,二刻为《警世通言》,海内均奉为邺架玩奇矣。兹三刻《醒世恒言》,种种典实,事事奇观。”市场的畅销使话本小说在读者之中取得最初的成功。后来的凌濛初“两拍”也有同样的情况,即一开始并非计划“两拍”,而是在《拍案惊奇》取得成功的基础上有了《二刻拍案惊奇》,那么《拍案惊奇》就叫做“初刻”了。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商业成功对于话本小说的发展的决定作用。试想,如果《古今小说》市场反应冷淡,那么以后的话本小说创作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就根本不会出现后来的繁荣局面。这样,由于书坊主和作家的成功合作,培育了最初的读者市场,接下来导致的直接结果使大批书坊主参与到话本小说刊刻中来,也使大批文人参与到话本小说的创作中来。如果以现在流传下来的话本小说数量来看,笔者认为,无法完全体现当初的繁荣程度,因为清朝禁书令的下达,小说自身不被看做严肃文学等各种因素,导致大批话本小说没有流传下来,这从“三言二拍”这些话本小说精品的命运就可看出能够流传下来是多么不易。

第三,由于话本小说“行世颇捷”,导致大量书坊主从业其中,竞争在所难免,而竞争的结果不但影响话本小说的文本形式,也影响话本小说作家地位、作家群体的形成。竞争手段各种各样,其一,做广告,话本小说作品中的“序”“识语”等都具有广告作用。比如出版商安少云在《初刻拍案惊奇》的封面就做这样的宣传:“本坊购求,不啻于拱璧;览者赏鉴,何异藏珠。”^⑬其二,在书籍装帧上下功夫,使用“绣像”;“三言二拍”等许多话本小说都有绣像插图。其三,利用名人评点。比如李贽、金圣叹等的评点来吸引顾客。冯梦龙不但编撰话本小说,也点评话本小说。更有书坊主为吸引顾客而“假托”名人评点等现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书坊主的市场经营

行为使古代小说批评形式——“评点”得以发展:市场行为影响了文学批评形式。正因为话本小说的市场化运作,使一些话本小说作者在文学场中获得了巨大的“象征资本”,比如冯梦龙、凌濛初、烟水散人等等,他们甚至可以影响书坊主的出版和经营。比如《石点头》就请冯梦龙作序,烟水散人编辑出版了许多才子佳人小说,从而成为影响才子佳人小说类型的关键人物。这样,在江浙地区,以苏州和杭州为中心,形成了以著名作家为中心的作家群体,构成了明清之际通俗文学场的创作队伍,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已经形成了小说流派:“苏州作家,笔者以为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冯梦龙为核心的小说流派——苏州作家群。这个群体主要成员有冯梦龙、凌濛初、席浪仙、抱瓮老人等……就是上述三位作家(即冯梦龙、凌濛初、席浪仙),创作了明代乃至整个话本小说史上最优秀的小说。他们有明确的创作主张,并自觉地以之指导创作实践,形成了鲜明的创作风格。”^⑭陈大康认为:“以拟话本为形式的短篇小说的出现,打破了长期以来长篇小说在通俗小说创作中占绝对垄断地位的格局,而冯梦龙有意识的积极推动,又使得拟话本迅速地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小说流派。”^⑮据宁宗一先生观点,从宋元话本开始就已经形成了流派,而且论述了他划分流派的理论依据,宁先生指出:

窃以为,流派是一种分类、一种概括,作为复杂的社会和的、心理的、时代的及个人的精神产品,它既无法按生物分类那样理出纲目种属,又没有为研究者提供所公认的流派取舍标准。那么,《都城纪胜》《梦粱录》《醉翁谈录》诸书对小说的分类和概括,就有着流派的性质,体现了一种流派观念的觉醒意识。事实上,流派的划分标准,从来就是多元的……^⑯

笔者同意宁宗一先生的观点,流派是一种文学研究划分,可以按照题材、按照地域、按照作家之间的关系、按照艺术和审美特征等等不同标准对历史上某一时期集中出现的作家作品进行流派划分。有理由认定,在明清之际的江浙一带出现的话本小说作家作品已经具有了流派的特征,而且形成了当时通俗文学场的核心。

第四,积极的理论倡导和出色的文本实践。话本小说作者在创作理论的倡导方面也卓有建

树,他们通过序跋的形式阐述自己的理论主张,形成了为通俗小说“正名”、创作定位到创作方法等具有逻辑统一的小说观念,并以卓有成效的小说创作对这些观念进行了实践,理论与创作的自觉,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并不多见,因此流派的形成也可以从这一点得到解释。这一点笔者有另文详述,此不赘述。

第五,话本小说市场化运作不得不考虑消费者——读者对话本小说的影响。事实上,话本小说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读者定位,即冯梦龙所谓“里耳”,因此,从话本小说的语言来说,采用白话即符合大众的阅读口味;从文本艺术形式来说,长期的“说话”艺术对大众欣赏习惯有一个塑形作用,话本小说的“拟书场格局”无疑更符合大众的欣赏习惯;对于题材的选择也是受到来自读者的影响,即一些身边琐事、新闻、政治事件等等成为话本小说的叙事对象,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第一次姿态下移,第一次以平民为主角(包括当时主流话语权力下地位底下的商人)等等,所有这些表现了话本小说的读者塑形

作用。读者的反向塑造对于话本小说的文本形态、价值追求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毋庸讳言,世俗文化对文人精神的裹挟,有时就是文人向世俗的屈从。尤其是当商业化已经顽强左右小说创作时,趋俗媚俗差不多成了小说的普遍特点,区别只在多少而已”^⑧。可以说,话本小说的文本形态、价值追求等等是一种“写——读”交流的结果,话本小说文本的艺术和审美特性无不围绕这种“交流性”展开。

综上所述,在17世纪的古代中国,在江浙一带,形成了以话本小说等通俗文学为主的文学场域,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次采取市场化的运作模式,这对于中国文学的传播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但应当指出,话本小说和一般商品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它是一种精神产品,这和“说话”艺术的精神特性是一致的,因此,其文本塑形还要受到这种特性的支配,同时,作家的创作理念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基金项目 2013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编号 2013CWX005);平顶山学院就业培育基金项目(编号 PXY-PYJJ-201401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平顶山学院文学院)

①同治《苏州府志》卷二[A],清李铭皖、谭均培修,清冯桂芬纂《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转引自宋莉华《明清时期的小说传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②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6-57页。
③李玉莲《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戏曲传播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19页。
④参考李志明《17世纪中国通俗小说编年史》[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该书以编年的方式描述了白话小说出版中心由福建向江浙转移的过程及其原因,同样可参考许振东《17世纪白话小说的创作与传播——以苏州地区为中心的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该书以苏州地区白话小说的创作和刊刻为对象,描述了苏州地区话本小说创作、刊刻、传播的关系。
⑤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传习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0-91页,第6页。
⑥李贽《藏书》(第十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27-1828页。
⑦张建业主编《李贽全集》(第一册,焚书注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76页。

⑧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三》[M],上海:上海中华书局,民国二十一年版,第22页。
⑨郑若玲《“累人”的科举》[A],《科举制度的终结与科举学的兴起》[M],刘海峰主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35页。
⑩多洛肯《明代福建进士研究》[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116页。
⑪⑬宋莉华《明清时期的小说传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第39页、第113-28页。
⑫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中)[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74页,第775页,第780页。
⑭傅承洲《明清文人小话本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3页。
⑮陈大康《明代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56页。
⑯宁宗一《倾听民间心灵回声》[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⑰王委艳《论话本小说序跋的小说观念》[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⑱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8页。